

人文
学术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

谢天振 王 宁 主编

廖七一 著

翻译研究： 从文本、语境到文化建构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exts, Contexts
to Cultural Construction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研究:从文本、语境到文化建构/廖七一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6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0442-4

I. 翻… II. 廖… III. 文学翻译-研究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7955号

翻译研究:从文本、语境到文化建构

廖七一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9.75 字数 244 千
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0442-4/I·824
定价:4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总序

中国的翻译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历史上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不仅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同时也催生了我国古代的翻译研究和相应的翻译思想。这些翻译思想,从三国时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六朝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到唐代玄奘的“五不翻”,尽管多属片言只语,零篇残什,但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翻译思想弥足珍贵,仍然可以为当今的译学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像唐代贾公彦关于翻译的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即使从今天的译学高度看,也堪称经典。

自从严复于 1898 年提出了“信达雅”三字以后,这三个字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差不多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翻译研究,或是讨论怎样翻译才能做到“信达雅”,或是以“信达雅”三字为标准去评判已有的翻译作品,或是探讨“信达雅”的内涵和外延,等等,几乎到了言必称“信达雅”的地步。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锺书提出了“化境”说,但其思想实质,严格而言,与“信达雅”说其实并无二致,孜孜以求的也就是要解决一个“怎么译”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同样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译学界却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以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为代表的一群学者站在语言学立场上,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切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功能对等”、“交际翻译”、“语义翻译”等概念,刷新了两千年来的西方翻译研究的面貌,实现了西方翻译研究的第一个根本性的突破。

与西方相比,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根本性转变,也即从传统译

论进入现代译论,具体而言,也即从仅仅关注“怎么译”的问题拓展到还要关注“何为译”、“译为何”等问题,时间上要晚一些,其起点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外语院系的师生和专家学者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国门,赴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深入访问、进修学习,其中对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专家学者首先接触到了以奈达为代表的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并在国内的学术期刊、大学学报上撰文评说,把他们了解到的信息传递给国内同行。这些文章部分结集成《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①于1983年出版,并与翌年编译出版的《奈达论翻译》^②一起,第一次比较多地介绍了外国、主要是西方以及苏联的当代翻译理论,从而为国内的翻译研究吹进了一股新风。之后,随着《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③、《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④、《翻译与后现代性》^⑤、《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⑥等编译著述的出版,更进一步推动并扩大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与此同时,从21世纪初开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南北两家外语出版社先后分别引进出版了数十种当代国外翻译理论著作的英文原版本,让中国读者可以直接面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英文原著,其产生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觑。

①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

② 谭载喜:《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

③ 许钧主编:《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共收入四本,分别为《当代美国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苏联翻译理论》(蔡毅、段京华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许钧等著)、《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廖七一等著),湖北教育出版社,分别于2000年、2001年出版。

④ 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年。

⑤ 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⑥ 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共收入八大译学流派33篇译学论文译文,均配以导读文章,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的翻译研究也开始发生变化,并朝着实现其根本性转变的方向而发展。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翻译学学科意识的觉醒上。在此之前,尽管中国的翻译活动也称得上丰富多样,译者和译作的数量更是堪称世界之最,中国的高等院校里也都开设了翻译课程,但相当多的人包括高校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对于翻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却不甚了了。不少人依然错误地认为,翻译不过就是把别人的东西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实践性技能,缺乏自身的原创性,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们看不到原本在一个有限的语言环境中产生有限影响的“原创性”著述通过翻译在另一个语境里得到的更大的传播和接受,甚至产生的更巨大的影响。他们更看不到最近几十年来,翻译本身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越来越得到来自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视角的关注和考察。翻译研究借助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已经突破了语言中心主义的狭隘模式,而成为广义的文化研究平台下的一个分支学科领域。翻译研究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甚至包括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目光。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学界的共识。与之相应,在中国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翻译学的大讨论后,终于在21世纪之初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得到了体制内的承认:目前已有159所高校建立了翻译硕士专业(MTI),另有一百余所高校建立了独立的本科层面的翻译系。此外,多所高校还都招收翻译学的博士生。

其次,体现在翻译研究理论意识的觉醒和跨文化研究视角的应用上。在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翻译研究多围绕文学翻译展开,而在文学翻译界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翻译是一门艺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再创造性质的艺术,于是翻译理论也就被定位在建基于这样一种艺术实践中获取的经验之上,并反过来要求其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翻译研究,大

多是围绕着翻译实践展开的一些经验体会,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可言。但是随着翻译学这门学科在最近几十年来的日臻成熟,当今的翻译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跳出原先局限于语言文字转换框架内的“术”的层面,而越来越多地上升到关于翻译的思想和原则的“学”的层面。这样的翻译研究成果往往能够改变人们对某种既定的翻译行为、标准、方法等的看法,导致一种新的翻译实践模式的诞生。不难想见,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翻译必将继续占据人类知识领域的重要位置,并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的居于对比语言学之下的翻译的定义应当根据翻译的最新发展进行修正和完善,翻译的内涵应该进一步扩大,要把翻译从纯粹字面意义的转述定义为文化层面上翻译、阐释和交际。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如谢天振的《译介学》^①、《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②,王宁的《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④、许钧的《翻译论》^⑤等著述所作的研究,正好契合了当今国际译学的最新发展趋势,并站在中国学者的独特立场,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再次,体现在对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的高度重视上。在此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史著作,对翻译史的研究同样少之又少。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在翻译文学史、翻译史的编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为止,翻译史类的著述已经超过30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翻译史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

①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2013年译林出版社推出该书的增订本。

② 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年。

④ 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国翻译研究》^①、《翻译与文学之间》^②，廖七一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③、《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④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作为翻译学学科三大支柱之一的翻译批评同样得到了高度重视，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⑤较早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最后，中国学者也没有遗忘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视角，他们同样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如黄国文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⑥和王东风的《连贯与翻译》^⑦等著述。

然而，尽管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的一些学者还在国际翻译研究或文学和文化研究刊物上主持过介绍中国翻译研究的专号^⑧，但是总的说来，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译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很了解。而由于传播的局限，甚至国内读者对于哪些学者和哪些著述能够代表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也不是很清楚。为此，我们决定编选一套翻译研究丛书“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集中展示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学者的代表性论著。我们将先推出“文库”的中文版，

①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② 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 廖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 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译林出版社，1992年。

⑥ 黄国文：《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⑦ 王东风：《连贯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⑧ 如王宁为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Neohelicon*, *Amerasia Jour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等十多家国际英文期刊主编了翻译研究与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辑，许钧与王克非也为 *META* 主持过“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的专号，等等。这些专辑不仅发表了数十位中国学者研究翻译的论文，同时也加快了中国人文学科国际化的步伐。

然后推出它的英文版,在国外著名出版社出版。入选本“文库”的作者应该是能够代表当代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其著述不仅在国内译学界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的一些论述也已经或者有可能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进而通过将将来英文版在国际权威出版社的出版,使得中国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得到国际学界的了解和承认。在甄选“文库”的入选人选时,我们也考虑有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外语语种的作者,尽量使入选的作者更具代表性。首批入选的六位作者既有比较文学学科背景,也有语言学背景;既有外国文学背景,还有中国文学背景。在外语语种方面,除英语外,还有俄语和法语背景的学者。入选的论文集原则上由作者本人从他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 15—20 篇的代表性论文,按内容编成三至四个部分,每本书的总字数控制在 20 万字左右。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第一辑入选的六位作者的论文集标题分别是:谢天振的《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王宁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翻译研究》,许钧的《从翻译出发:翻译和翻译研究》,王宏志的《翻译与近代中国》,廖七一的《翻译研究:从文本、语境到文化建构》,王东风的《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在条件成熟时,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第二辑和第三辑。我们希望通过本“文库”的编选和出版(包括在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不仅能为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作出贡献,同时还能把能够代表中国译学研究前沿的专家学者及其代表性著述带入国际翻译研究界,让世界更直接、更快捷地了解中国的学术,让中国翻译界的学术研究切实有效地走出国门。

谢天振 王 宁
2014 年 2 月于上海

前 言

许钧教授曾经说,中国的翻译研究与西方相比,大概落后 20 年。这 20 年的差距,也许是一些中国学者立志了解西方、引进西方的研究成果、逐渐走上自己研究道路的契机。

我 1982 年开始研究生学习,硕士论文是研究美国犹太文学家索·贝娄(Saul Bellow),最初发表的论文也与文学或文学翻译相关。和绝大多数的英语教师一样,毕业后我的主要精力也都在英语教学上;业余时间,在蓝仁哲教授等的指导下开始翻译一些文学和社科著作。主要译著有:《裸猿》(天津百花出版社,1987 年)、《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年)、《哲学、数学、文学》(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伯特兰·罗素卷,漓江出版社,1992 年)等,也翻译了不少科技文献,总数接近 300 万字。这些翻译为日后讨论翻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四川外语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增设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方向,我有幸参与教学,开始关注翻译“理论”。这便是我“恶补”西方翻译理论的开始。读过一些书,做了不少笔记,尝试从“信达雅”之外的视角来审视翻译。早期发表的论文要么讨论西方翻译研究的普适性,如《也谈西方翻译理论中的等值论》(《中国翻译》1994 年第 5 期)、《试论纽马克的翻译观》(《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5 年增刊);要么尝试用西方翻译研究的思路或方法来分析文学翻译,如《英汉翻译中意象的处理》(《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5 年第 1 期)、《现代诗、意象、翻译——评“爹爹”一诗的三种译文》(《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 年第 1 期)、《论翻译中的冗余信息》(《外国语》1996 年第 6 期)等。

2000年,我和当时的学生、如今的同行祝朝伟教授、张凌教授、陈喜荣教授和芮敏教授等,共同完成了四川省教委的研究项目《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年),得到译界的认可。其后又参与许钧教授的“教育部资助优秀教师基金研究课题”。1999年得到教育部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访学,与多位当代英美翻译理论家,如E·A·奈达、S·巴斯奈特、T·赫曼斯、K·马尔姆克亚、I·梅森、C·沙夫纳等建立起联系,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2001年,祝朝伟教授、张凌教授、李小均教授、唐伟胜教授等,与我共同完成了《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这两部编著,尽管现在看来有诸多不足,但在编写中我们了解和熟悉了当代西方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范式,开阔了视野。

在以后的数年中,西方翻译研究逐渐为国内翻译界所关注;译介和评论文章、著作日益增多,西方翻译研究的范式与方法逐渐被国人认可和接受。对西方理论的译介热情一度远远超过对实际翻译问题的研究,也曾出现简单化或滥用国外知识资源的现象。西方的翻译研究尽管代表了当代学术研究的主流话语,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毕竟是“地域性”学术话语;简单地译介西方的研究成果也有自身的局限。翻译理论只是用以研究翻译问题和翻译现象的工具,是人为的话语建构。翻译研究的终极目标,我个人认为,是翻译本身。

如果说中国翻译史上有四次翻译高潮,20世纪的首尾就经历了两次高潮。翻译的学科之广、著作之多、参与人员之众、影响之巨大与深远,都堪称历史之最。翻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文化面貌。奈达曾经说过,中国有悠久的翻译史和丰富的翻译文献,是一个巨大、丰富的翻译研究实验室^①。我们在追求西方翻译研究“本色的了解”、吸取西方文化资源

^① E. A. Nida and Liao Qiyi,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Dr. Eugene Nida”,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3, 2000, p. 52.

的同时,应该关注自己的“地域性”研究——考察中国独特的翻译现象和我们面临的翻译的具体问题,我们对中国翻译问题的研究或许能超越地域性而上升为普适性话语。这是一个长远而宏大的目标,我不敢奢望有多大的进展;2004年获批的重庆市教委重点社科研究项目“胡适诗歌翻译研究”、2005年获批的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五四前后文学翻译——翻译规范的创建与流变”、2010年获批的重庆市社科项目“抗战时期重庆翻译文化研究”只是个人沿着上述思路所作的一些探索。

如果说《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和《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只是对西方的学术资源的梳理与评介,那么《胡适诗歌翻译研究》则是从文化转型、时代精神与经典建构等不同视角系统研究胡适的诗歌翻译,探讨翻译与中国文化、中国的文艺复兴、白话运动,以及与新诗的草创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谢天振教授对成果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称“意义决不简单地在于‘补白’”,而且将翻译研究提高到“广阔的文化层面”,并“为国内比较文学界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个案研究的范例”^①。《五四前后文学规范研究》则聚焦于晚清到“五四”短短20年间中国文学翻译时尚与潮流的急剧转变,从社会规范理论与社会叙述理论考察从晚清到“五四”的翻译规范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影响方式与传播渠道。规范不是简单的既定事实,翻译家也不是被动地遵循特定的翻译规范行事;规范一方面驱动与制约翻译活动,另一方面鲜活的翻译活动也能动地强化甚至建构翻译规范。笔者希望揭示规范的建构性,探讨规范的生成机制。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国的翻译研究已有长足的发展,不仅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得到行政体制的认可。我个人的研究焦点从文本、视角和研究范式逐渐转移到翻译的文化语境与文化建构;学术重心似乎从微观、中观发展到宏观研究。早期的研究基

^① 谢天振:《国内文学翻译研究的一大突破》,《文景》2005年第11期,第75页。

本上局限于翻译教学的讨论,局限于文本之间的转换;关键术语是“信达雅”,“直译、意译”,“意义”,“风格”,“神韵”的再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成为我研究的中心,论文大多与这些议题相关。2003年以后,我所有的课题都聚焦于中国特有的翻译现象与翻译问题。与此同时,研究视角也从技能层面上升到研究范式、文化语境到文化建构层面。翻译不再是字当句对的语言转换,甚至也不再是翻译家手上把玩的艺术品(我丝毫没有轻视艺术家成就与贡献的意思),翻译是积极的、意义深远的社会文化行为。

在经历了语文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转换之后,当代的翻译研究似乎和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美学、人类学一样,都在向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从模仿论转向了行为论和文化论。关注点也从原作者、原文本转移到译语文本和译文读者。描写性研究取代了规定性研究;主观印象式的点评已经逐渐淡出,取而代之是客观描述、实证甚至语料库研究;问题意识、跨学科甚或去学科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常态。我2012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翻译批评话语研究”正是希望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来考察近百年来翻译批评的一些核心问题:如何评估特定文化语境中翻译作品的质量,译者选择待译文本的动机,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背后的翻译理念,翻译批评和翻译论争所折射出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翻译批评话语与国民思想的演进之间的张力。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观察,翻译和翻译批评话语都是不同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叙述的顺应与强化,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建构。巴斯奈特曾经说过:译者在“改变文本的同时改变了世界”(change the texts and so change the world)^①。中国在

^① Susan Bassnett, “The Meek or the Mighty: 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 in Norman Alvarez and M. Carmen-Africa Vidal, ed.,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6, p. 23.

翻译西方、了解西方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所翻译的西方、我们对西方的译介、诠释和批评已成为改造固有国民性、形塑现代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

检视过去的研究理路,我要感谢学界同人的提携、指导和批评。许钧教授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和《当代英国翻译研究》作序,肯定其中的积极因素;谢天振教授为《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所撰写的书评、十余年来在川外授课期间与笔者的交流;北外王克非教授、《中国翻译》杨平老师、《外国语》束定芳教授、《外语研究》杨晓荣教授等,为书中的一些观点提供面世的机会;还有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学者的支持与批评,都使本书中的一些观点趋于成熟,在此一并致谢。文中的舛误和纰漏,祈望译界同行指正。

2013年岁末于歌乐山麓

目 录

前言	1
----	---

上编 研究范式、视角与方法

文化观念与翻译	3
MTI 中的翻译理论教学	17
语料库与翻译研究	30
翻译规范及其研究途径	49
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	61
跨学科综合·文化回归·多元互补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走向试评	73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	88
中国翻译研究学科发展概况	103
翻译研究学科结构与体制外视角	122

下编 翻译研究的历史语境化

晚清公共叙述与翻译规范	137
论马君武译《哀希腊歌》中的“讹”	156

苏曼殊译诗中的“晦”与价值取向	177
秘密的分享者	
——论庞德与胡适的诗歌翻译	190
从翻译规范看《域外小说集》	205
《新青年》与现代翻译叙述	224
“五四”文学翻译对“信”的重构	238
抗战历史语境与文学翻译的解读	253
文化典籍的外译与接受语境	269
《哀希腊》的译介与符号化	285

上 编

研究范式、视角与方法

- 文化观念与翻译
- MTI 中的翻译理论教学
- 语料库与翻译研究
- 翻译规范及其研究途径
- 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
- 跨学科综合·文化回归·多元互补
-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
- 中国翻译研究学科发展概况
- 翻译研究学科结构与体制外视角

